

发现·运河

“马厂炮台的修建和《辛丑条约》签订有关”“东营区炮台9座,西营区炮台5座,屯兵25营,2万余人”……一直以来,外界对青县马厂炮台的认识有着种种误区。青县打捞地域文化志愿者团队经过多年研究,为马厂炮台、马厂兵营还原了真相、丰富了肌理,确定炮台因“天津教案”修建,屯兵1.2万人,让这段历史变得更加清晰、更有力量。

百年老炮台 又有新发现

本报记者 杨静然



兵营建造并非因《辛丑条约》签订

冬日的运河,萧瑟中带着几分苍凉。沿河一路向北,就来到了运河青县段最北端的马厂炮台。

蔚蓝的天空下,炮台斑驳古朴,满面沧桑。这里,是青县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也是大运河畔重要的军事遗址。历史上,太多的人物、事件、战争在这里交织,见证了近代以来的百年风云。

如今,炮台壁垒斑驳,但依然难掩曾经的恢宏气势。抚摸着它的身躯,仿佛听到当年金戈铁马的厮杀声,回到了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。

为什么是这里?

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的孔繁廷,曾无数次地发问。几年前,他来到了青县政协文史委工作。那时,只要有外地来的考察团都会到马厂炮台参观。久而久之,他对于马厂兵营、炮台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。每当有人说起马厂炮台的修建和《辛丑条约》签订有关,他都会产生疑惑:马厂兵营建于1871年,《辛丑条约》签订于1901年,前后相差30年历史,怎会有关联?

他将自己的疑问说给青县文史爱好者潘洪斌,从此二人踏上了一段旅程——寻访历史深处的马厂兵营。

1870年,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,他以“青邑地近畿辅,拱卫攸关”为由,奏请同治皇帝在马厂设防,获准。同治十年(1871年)二月,李鸿章将自己的准军部将周盛传调驻马厂,人称“盛字军”。周盛传部进驻马厂后,便开始建兵营、造炮台……

兵营规模有多大?光绪元年(1875年)编纂的《青县志》给出了答案:

“今准于同治十年二月,蒙督宪李伯相(李鸿章)以青邑地近畿辅,拱卫攸关,奏调准军盛字勇步二十三营、仁字步队两营,共员弁勇夫二万一千余人,由山东济宁州移驻青县马厂。”

“2.1万名驻军来到青县,没有重大的历史事件,清廷不会如此兴师动众。”潘洪斌分析道。

翻看19世纪末中国历史年表,他和孔繁廷的目光不由得落在了天津教案上。

同治八年(1869年),法国传教士谢福晋在天津三岔河口地区建造了望海楼教堂,教堂建成以后,天津卫儿童失踪案时有发生,有人在河东盐坨地发现了多具儿童尸体。天津知县经过侦查,缉拿到了人犯,其供词牵扯到了望海楼教堂。

天津知县刘杰同人犯到望海楼教堂对质,引发大批群众围观。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闻讯到通商衙门,威逼通商大臣崇厚出兵镇压群众,崇厚不允,丰大业遂向崇厚连开数枪未中。群众听闻后,纷纷涌向通商衙门,引发了“火烧望海楼”这场大规模的中国民众自发的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。群情激愤下,当场打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,后又打死了谢福晋和修女、教士20人以及30多名中国信徒,并且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、法国领事馆和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6处书

堂,还有洋行、仁慈堂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“天津教案”。

天津教案发生后,法、英、美等7国以法国为首向总理衙门“抗议”,并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威胁。同治皇帝对于外国的武力胁迫心有余悸,给李鸿章下密谕,命令准军驰援畿辅:“此事该使任意要挟,且以兵船恫吓,势将决裂……克日启程,驰赴近畿一带驻扎,届时察看情形,候旨调派……”

这道密旨,在李鸿章《遵旨带军赴直折》里有所披露。

仅仅是书中的记载,仍让人存疑。潘洪斌和孔繁廷又到天津小站,那里完善的资料让二人的猜测得到了印证——马厂炮台修建的背景,并不是《辛丑条约》的签订,而是天津教案。

同时,在同治九年(1870年)十二月初一日李鸿章《筹议天津设备事宜折》中得到了明确证据:“铭军西去,畿辅空虚,请将准军调驻海口,并令沿江沿海暂缓撤防、严行戒备……伏查津案(指天津教案)虽经议结,武备必须讲求,此中国百年之计,非一朝一夕所能为功也。”

“影响力越大,越需要我们去更正”

当时,李鸿章奉谕立即从陕西启程,同时命刘盛藻、郭松林、周盛传等部分驻直隶、山西与山东交界处,准备随时进援直隶。

就这样,周盛传所率盛、仁等军,包括23个营、1.2万人的队伍最终进驻马厂,开始动工兴建兵营,两年后竣工。

那么,兵营选址马厂的原因是什么呢?

李鸿章同治九年(1870年)十二月的《筹议天津设备事宜折》记载:“……曾该提督(周盛传)单骑来津,遍察大沽、北塘海口及津通各处形势,据称……海口炮台但求土木兴建均宜,不在兵数过多,而后路数百里间必须重兵坚垒、巨炮相望,节节布置联络,乃可自立不败之地而争胜于外……该军只宜移扎静海、沧州之间,整肃操防,以应而作声势,勿通扎海口,徒使彼族惊疑……”的记述。而周盛传同治十年(1871年)二月的《移扎马厂禀》中也有记载:“连日遍阅静海所属地势,均不合宜,惟青县、静海两界之马厂地方,熟田不多,宽坦,可以多扎营垒……计此处距津一百三十余里,既可遥作声势,有事亦可为畿辅后路声援……”

“海防驻军过多会引起外国惊疑,而马厂位于沧州与静海之间,距离天津五六十公里,可以在关键时候驰援京津。这里土地宽阔,适宜驻军。”孔繁廷说。

在梳理马厂兵营建造历史的过程中,潘洪斌和孔繁廷对这里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。

在他们看来,周盛传不仅是兵营驻军总统、马厂兵营的设计师,还是个心思缜密的人。

别的不说,单是兵营的布局足以说明。“当时的兵营在运河两岸分设两个

营区,以东为主、西为辅,隔河相望。运河上常设军事渡船,两个营区均有土围墙。围墙上巡城马道,城角设有岗楼,日夜守望。”孔繁廷说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潘洪斌和孔繁廷发现,无论是李鸿章的奏折、周盛传的自撰年谱,还是《准军志》《准军史》,都对当时驻扎人数有详细的记载:“周盛传所部盛、仁各军一万二千人,尚称劲旅……”“……有周盛传的盛军,唐仁廉的仁字营马队,共一万二千人……”的记载。这说明,当时盛字军和仁军的总人数为1.2万,而非非光緒《青县志》中所说的2.1万。

“这是一个严重的事实性错误。因为光绪元年(1875年),修志者编修县志时,盛军主力已经到了小站。而且当时编纂县志的地方官员很难见到李鸿章、周盛传等人的奏折和禀帖,信息获取受到局限。所以,我们猜测,修志者并不详细了解兵营的情况。”潘洪斌说,后来的很多资料都引用于此,为了防止以讹传讹,他们有责任去更正事实。

以史为据 大胆地猜测设想

当地人都知道,马厂兵营建立初期,共有14座炮台,以运河为界,运河东岸是9座炮台,运河西岸是5座炮台,现在唯一保留下来的就只有中央炮台。

然而,通过走访人和镇乡贤刘子江老先生,得知马厂共有16座炮台,多出来的两座是中央炮台和月牙炮台,现存中央炮台并不在14座之内。

但在后世引以为据的《青县志》中为何只记载了14座炮台?

潘洪斌和孔繁廷翻阅了大量的史料后推测,中央炮台和已经消失的月牙炮台的修建晚于城墙上那14座炮台。

“同治十二年(1873年)马厂兵营建成后,天津的海防问题便提上了日程。又是周盛传率人勘查,于3月率兵重筑新城城垣和炮台。青县马厂的中央炮台与其非常相像,可能就是在修筑完新城炮台后,回来又建的中央炮台。”孔繁廷说。依据于此,他们还提出,马厂兵营不仅可以保卫京津,也是海防要地,与天津海口的炮台遥相呼应。

马厂炮台作为军事重地,历经多次战火,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巨变。与其一样在岁月深处久久回响的,还有建造者周盛传、周盛波兄弟的智慧与才能。他们不仅在这里创建马厂兵营,使这里成为中国军队现代化的策源地,而且兴水利、改土壤、开挖马厂减河,使沿河碱地变良田,新增垦田以百万计,造福一方。为青县马厂留下了说不完不尽的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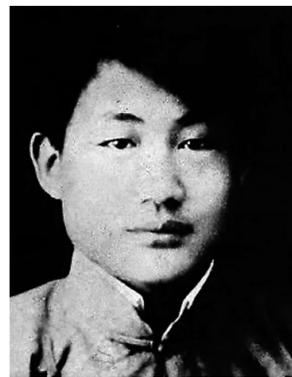
驻兵屯田、编练新军、马厂誓师、直奉战争、北伐战争、抗日阻击战……百余年的轰轰烈烈变为如今的恬淡安详,而这,已经成为马厂炮台独有的气质和高度。

对于潘洪斌和孔繁廷来说,马厂炮台更像是一座文化宝库,里面珍藏着无数宝贵的“文物”,每一件都是青县历史的见证。越来越多的文史爱好者参与进来,丰富着青县的历史与文化。

革命着是最快活和自由的——

日记里的新闻战士傅国光

杨金丽 吕少军



“环境开始恶化,一天来几乎脱离了机关,过着分散游击式的生活……躺在青纱帐里,望着亮晶晶的星空,忽地,一个流星擦空而过,不知去向,使我感到自然的伟大、斗争的喜悦。每当那个时候,我常和同志们说,我们现在是最快活和自由的……”

这是傅国光在1943年抗战最残酷的日子里写在日记中的文字。时隔80年,再看这本日记,依然令人动容。

傅国光是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抗日英烈之一。抗战烽火中,他以病弱之躯,担任《烽火报》《冀鲁日报》社长兼总编辑,在鬼子眼皮子底下传达党的声音,27岁就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。生前,他写下十几万字的日记,记录了艰难岁月办报抗战的情景,其中有他对信仰、革命的追求,也有对生死、爱情的认识,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

“给自己以勇敢的解剖”

傅国光,是从盐山走出的冀鲁边区的八路军新闻战士。

曾在盐山县党史办工作过的宋胜利告诉记者,历经战火,傅国光日记完整保存在烈士妹妹傅素梅手中。1986年,盐山县党史办工作人员将两本日记借到手,抄写后又将原件归还傅素梅。这两本抄写下来的日记,成为研究傅国光烈士的重要资料。

“在政治上,对于自己,不仅要做一个精细而大胆的解剖家,而且还要做一个医治自己病症的圣手。现在,应该使自己陈腐的尸体躺倒下来,给以勇敢的解剖和医治……”

这是傅国光写在日记扉页上的文字。透过这些文字,傅国光的形象渐渐清晰起来。

傅国光是盐山县百尺杆村人。他幼年丧母,父亲是一位学识渊博、有正义感的中学教师。他先后在盐山高小、河北省立第二中学(现沧州一中)和当时的北平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读书,越来越深地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黑暗,迫切希望寻找救国救民之道。1935年,因为积极参加“一二·九运动”,他被学校开除。1936年,他考入西安大学,他积极参加了声援张学良、杨虎城,反对内战的革命活动。

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,傅国光毅然放弃了在西安求学的机会,从西安返回家乡参加革命,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38年8月,盐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。傅国光先在文教科与马振华等一起开展抗日宣传教育活动;后调任冀鲁边区总战委会宣传部长、冀鲁边区文教总会出版部长。1939年初,他被调到冀鲁边区党委机关报《烽火报》,任社长兼总编辑。

“以天为帐,以地为床”

《烽火报》创刊于1938年春夏之交,其前身是冀鲁边区特工委机关报《血花》。

傅国光刚到《烽火报》时,只有十几名工作人员,2台中型石印机,报纸三日刊,4开4版,每期只能印1000多份,且没有电台,收不到延安的消息。他感到这远远不能满足抗日斗争的需要。他向党委请示,要求建立健全报社机构,扩大组织;找到出版科,请他们想方设法购买石印机;派人到敌占区买回电讯器材,自己动手组装电台;还派人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,购回白纸……仅1年,《烽火报》社就有了100多名工作人员,大型石印机5台,电台也组装成功,能收到延安的电讯。5台石印机日夜开工,三日刊改为

两日刊,每期发行5000份,为冀鲁边区抗日救亡运动鼓与呼。

1940年,日寇对冀鲁边区不断扫荡,办报环境越来越恶劣。傅国光带领大家辗转于宁津、乐陵、盐山一带,在十分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印发《烽火报》。

1942年7月,《烽火报》改名《冀鲁日报》,傅国光任社长兼总编辑。此时,日军纠集上万兵力,对冀鲁边区不断进行铁壁合围、拉网扫荡,报社经常活动的一分区环境更为恶劣。地委书记杜子孚、专员石景芳、组织部长郎玉栋、边区妇救会主任崔兰仙等相继牺牲。傅国光带领精简后的报社工作人员轻装东进,来到盐山东部,不久,《冀鲁日报》在这里出版,并发向整个冀鲁边区。

他在日记中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笔触记录了辗转各地艰辛办报的情景。

“晚上又野露,明月清风,没有一丝云彩。以天为帐,以地为床,吸着新鲜的空气,我笑着说:‘如果不是抗战,我们想也不会想到这种美景的享受!’……”

“我胜利地微笑了”

傅国光的身体本就不太好,长期艰巨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使他旧疾未愈又染新病,最终病倒了。经过4个多月的休养,病情稍好,1943年4月11日,他返回工作岗位。

当时,日军经常到盐山一带扫荡。6月15日,日寇突然包围了《冀鲁日报》工作的村子。傅国光不顾自身安危,先通知其余同志转移,看到屋里没收拾的纸,他赶紧装好碎纸。等到出门时,敌人已进了胡同口,幸亏一位大娘掩护,他才没被抓。当晚,他在日记中写道:

“我得到一次牺牲的体验,革命牺牲原是自然的,但对个人来说,却往往从偶然事件中去表现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脱生,结果,我胜利地微笑了。”

6月底,日军再次扫荡,报社被敌人冲散了,3台石印机也被抄走。面对严酷的现实,傅国光并不悲观。他召集跑散了的部分工作人员,带上仅剩的2台石印机,由盐山转移到庆云北部,继续出版《冀鲁日报》。

9月下旬,敌人又开始了秋季大扫荡,来势十分凶猛。

9月26日晚,细雨连绵。劳累了一天的傅国光与同在该区工作的妹妹傅素梅,在庆云小魏庄一个堡垒户家中休息。第二天拂晓,几十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村子要抓壮丁。傅国光来不及隐蔽,就被翻墙而过的鬼子抓住,同村里的青壮年一起被赶到大魏庄。鬼子见他手上没有老茧,衣服上还有墨水痕迹,怀疑他是共产党,对他用尽酷刑,傅国光只字不吐。敌人又把他绑在大树上,以死相逼,他仍不屈服,最后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。

鬼子走后,在群众的帮助下,战友们把傅国光的遗体连夜秘密运回家乡。清洗遗体时,人们发现,他全身被刺十几刀,面容坦然安详,毫无惊恐之色。

“发着曙光的一年”

很多年后,盐山县政协副主席吕少军翻看傅国光日记。最后一页,是傅国光牺牲前一天写下的,记述了自己的一个梦。梦中他被捕牺牲,那情景和现实简直如出一辙。看到这里,吕少军禁不住掩卷长叹:原来,傅国光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,作好了为革命随时牺牲的准备,才能那样坦然地慷慨赴义,从容就死。

“在人类历史上,这是发着曙光的一年。人类恶魔——世界法西斯将在今年灭亡!世界劳动者将获得自己天定命运的胜利。在这元旦,渺小的自己虽然依然过着平凡的生活,想到充满胜利与光明的一年,是感到庆幸与兴奋的。对那些为人类世界的无产者而牺牲的无名英雄,却不能不怀着志念与庆幸。”

这是傅国光在1943年1月1日写下的《元旦献词》。2年后,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。傅国光,那个定格在27岁的年轻新闻战士,也永远留在了中国抗战的史册上。

青县,历史悠久、文化底蕴深厚,沉淀数百年的城市记忆,流淌在青县人的血脉中。盘古文化、运河故事,犹如一座座珍贵的文化宝库,吸引着后人不断地去探索、寻觅。就这样,一支热爱文化的团队——青县政协“守望麦田 记住乡愁”打捞梳理地域文化资源志愿者小分队(以下称青县打捞地域文化志愿者团队)诞生。他们行走乡间,搜集老物件、记录老故事、打捞各类文史资料。

在他们的不断追寻下,一段段鲜活生动的故事,拂去历史的尘埃,清晰了面容。马厂炮台,便是其中之一。

“关于马厂炮台,一直有着那样那样的误读,包括‘马厂炮台的修建和《辛丑条约》签订有关’‘东营区炮台9座,西营区炮台5座,屯兵25营,2万余人’等建造原因、布防及人数,甚至连志书以及一些重要的史料里都记载有误。”团队志愿者孔繁廷一席话,让这座百年历史遗迹再次受到外界的关注。



潘洪斌(左一)和孔繁廷(右一)寻访炮台遗址。